

专业化建设的中断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转型

缪 青

“专业化中断”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作者考察了两种观点,认为它们未能揭示中断过程的全貌。从微观与宏观结合上,作者运用系统分析展开了中断过程的最为重要的历史与人的选择,勾挑出了三个阶段性的结构因素:社会学范式转换、外来模式的影响、展开理论的探索,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学理论转型的讨论。对中断的历史分析,揭示了学术争鸣、中外社会学理论选择、对重大发展问题的正视,是中国社会学理论成长和建树的基础。作者强调,重述历史是一种理论行为,是对中国社会学思想发展的社会学再认识,这一反思使人看到了经验研究所看不到的历史,看到了经验分析的局限。反思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和理论建树。

作者:缪青,男,1954年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社会学专业化中断的传统解释

20世纪5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学思想史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值得关注的时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近半个世纪的战乱和社会动荡的结束,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行将展开,“为了适应有计划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对建设人才的急迫的需要”^①中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社会学、政治学等一批学科被取消了。与此同时,与社会学相关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的研究也停止了。^②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社会学中断问题。

从中国社会学思想史的视角来考察,50~70年代的学科中断应更为严格地界定为中国社会学专业化建设的中断(以下简称专业化中断,中断问题)。因为:第一,专业化中断并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学思想家、学者社团对中国社会所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和研究完全停滞了,“社会学的研究多少被其他各学科代为承担了一部分”;^③第二,“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在某些新的土壤中还是在那里生长繁殖,并得到不少发展,最显著的就是民族学的研究”。^④

谈到社会学专业化中断,有必要指出一点,即便是在50年代以前,中国高校也发生过部分社会学系被取消的境况,这可以称作部分专业化中断。1923年,上海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瞿秋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页。

③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8页。

④ 韩明谏:《中国社会学100年》,载《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年增刊:《社会学与社会改革论文集》。

白、施存统等先后任系主任。^①令人遗憾的是,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上海大学为国民党当局强行封闭,因而中国高校中第一个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学系被取消了。这意味着,50年代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发展,主要是通过非专业化形态实现的。此外,在40年代后期,一些大学的社会学系的学者和学生,由于投身革命运动,一些社会学系也被当局停办了。^②

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其规模之宏大,起伏跌宕之剧烈,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都不能不视为蔚为壮观之作。然而,作为描述和解释这一伟大变迁的中国社会学,这门注重刻画中国社会发展以及中国人行为变化的专业学科,为什么在50年代未能象哲学、历史学、经济学那样继续发展,而是被取消?迄今为止,较为通行的观点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大学的讲坛,社会学被取消有其自身的原因。旧社会学为剥削阶段服务,“阻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布”,^③视社会革命为“变态的变迁”,^④在中国革命行将胜利之际,一些人仍旧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用改良主义的主张对抗革命”。^⑤在批判旧社会学的同时,不少研究者认为,“社会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⑥因此,不给旧社会学以大学讲坛的地位似乎是有理由的。这种观点在50年代占主导地位。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学学科的取消是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片面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⑦一位美国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一位苏联专家在中国教育会议上透露苏联没有社会学。因此,中国取消社会学完全是效法苏联。”^⑧

第三种看法把专业化中断在很大程度上归诸于执政者的个人行为,认为“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对社会主义的经济、阶级和上层建筑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内否定社会学理论、终止社会学研究也负有相当的责任”。^⑨这种看法出现在80年代,比较看重个人的责任。

如果深入探究,便不难发现,关于专业化中断的这三种观点,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未能揭示50年代社会学专业中断的历史全貌,而充其量也只能为专业化中断的历史过程提供一幅不完全的图景。这或许是由于对历史的经验事实了解不够,更为可能的是,人们对已经呈现出来的经验事实分析的不够。很明显,前述三种观点基本上没有超出经验分析的水平,它们注意的是专业化中断历史过程的一些细部、一些环节,而没有顾及这些细部前后左右的总体结构,没有把人的选择放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学思想史的过程中去把握。因而它们在展示同一历史事态的过程中,使人们看到相互冲突、互不相干的一堆经验描述,而在了解专业化中断的全貌方面仍然陷于困惑。

二、对社会学专业中断的重新审视

如果我们将上述细部、环节放到更为广阔的中国社会发展背景中去考察,从微观与宏观的

① 《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页。

② 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

③ 孙本文:《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思想内容及其对旧中国的影响》,《新建设》1956年第11期。

④ 胡绳:《枣下论丛》,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8、203页。

⑤ 胡绳:《枣下论丛》,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8、203页。

⑥ 胡庆钧:《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问题》,《新建设》1957年第1期。

⑦ 袁方:《发展中的现代中国社会学回顾与发展》,载《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年增刊,《社会学与社会改革论文集》。

⑧ R. D. Arkush 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页。

⑨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

结合上,沿着社会学思想史的脉络去观照中断过程,那么势必要作出如下努力:

1. 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考察中断过程中的诸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2. 把中断问题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学思想史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予以解析;3. 这种考察是以对中国社会学的社会学再认识的学术自觉,展开对中断问题的理论反思活动。这种反思将展现出新的历史视野,使我们看到前述经验分析看不到的世界。

1.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功与传统理论的危机

在40、50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发展最令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新的一页。

无论人们对新的共和国抱有什么样的看法,都不能不承认,中国革命的胜利“第一次在一个新的世纪中提供了政治秩序、安全和诚实政府,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成就”。^①这一成就本身无可争辩地结束了2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思想家、学者中间的一场长期的争论——中国发展是应当走枝节改造的改良之路还是走根本改造的革命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对于中国知识界、学术界许多人造成了怎样的震动,从梁漱溟的思考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他坦率的承认,自己对马列不通,“误以为斗争只是斗争,不料想毛主席却有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一套运用。于是就不但分开了两面,始终斗而不乱。而且不断扩大自己一面终于制胜强敌”。^②面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变革的成功,中国社会学的许多学者和青年学生不能不感到,主张改良主义的传统社会学理论^③未能有效地说明中国发展的现实,认为传统理论“搞错了”。

很明显,对于“坚决不相信”革命性变迁的传统理论,中国革命不仅“竟然出现”了,而且成功了,这就对传统范式^④提出了一个巨大的“反常”;^⑤而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这一革命性变迁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正是这一政策所设计的预期的实践之必然。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独特现实,人们不能不在两种社会学理论范式中^⑥进行选择 and 比较。人们的思想震动表明,他们对传统范式的怀疑产生了,增长了。

另一方面,对于知识界许多人这种思想上的震动,毛泽东显然是感到了。他写道:“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⑦

从1949年开始的知识分子重新学习包括以下内容:组织知识分子参加政治学习,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社会改革实践。1951年秋,周恩来应邀对北京、天津高校3000余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使这场运动达到了高潮。在1952年秋这场运动大体结束,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教师的91%、大学生的80%、中学教师的75%参加了学习。^⑧

① M. Meisner 著,张瑛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②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25页。

③ “传统社会学理论”在这里用来定义50年代以前,中国高等院校中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和专门研究活动。它是20世纪中国社会学的两个主流范式之一,受欧美功能/经验分析学派影响较大。以往中国学者用“纯正的社会学”、“旧社会学”、“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学院派社会学”来指称它,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它的看法。

④ T. S. Kuhn 著,李宝垣等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43页。

⑤ T. S. Kuhn 著,李宝垣等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43页。

⑥ 两种社会学理论范式是指主张改良的传统社会学理论范式与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范式。

⑦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⑧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97页。

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知识分子的重新学习在一开始就是同改造旧教育并行不悖的。1949年政协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①这项工作包括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接办外国津贴的教会大学,向工农开门办学,规范基本学制,教育面向国家经济建设等等。^②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知识分子重新学习还是在高等学校开设“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新课程,对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影响是颇为不同的。一般而论,对于数学、物理、化学、工程技术和医学等学科,上述学习更多地是涉及个人思想认识的调整,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较少涉及阶级性、民族性这类社会认识的争论。而上述课程的开设,对于社会学的影响就复杂得多。尤其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它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注意力恰好是放在社会变迁方面,这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所涵盖的范围大体一致。这样一来,社会学传统理论指导下的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与分析,在许多方面不能不同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发展的分析发生交汇乃至碰撞。因而,新课程的设置对于中国社会学的专业化建设而言,就不仅仅是涉及专业研究人员个人思想上的调整,而且是涉及学科基础理论与专业研究范式的调整,这可以说是一种双重的调整。

事实上,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已经社会实践而广泛传播(虽然具有强烈的经验色彩)。中国社会学的课程改革已经初步开始了。傅懋冬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一文中回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社会学系许多教授、老师有进步思想,倾向革命,支持学生运动,特别是全国解放前夕,不少教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重新认识和讲授社会学课程”。^③

1950年7月,政务院第4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决定》要求按照政协共同纲领的规定,使教育“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调整专业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④在课程改革过程中,经过教育部课程改革研究委员会讨论并确认,社会学系的课程作了大幅度调整。

比较一下50年代前与50年代初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课程,会发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社会史》、《政治经济学》、《马列名著选读》成了社会学系的基础理论课程。^⑤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学专业化发展的主导理论。新旧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转换首先由高等教育体系中课程调整及教科书更换为起始,^⑥其在理论范式转型中具有标志性,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学专业化进程开始了理论转型。

导致这一转型的认识上原因,既包括社会学理论范式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对照,也包括不同范式之间的权衡。显然,传统理论由于在它的框架内未能解释和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令世界瞩目的“巨大历史成就”,从而陷入了一场理论危机。“而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指示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抛弃一个范式的决定,始终是同接受另一个范式的决定同时发生的”。^⑦因此,50年代初社会学的专业改造以及对孔德一系社会学思想的批判,除开政治文化背景外,反映了中国社会学理论领域的一场范式革命——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取代传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七册,第17页。

②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页。

③ 《社会学研究与应用》,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编,1984年版,第277页。

④ 《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高教部办公厅编1958年版,第101页。

⑤ 参见傅懋冬整理:《燕京大学1930—1950年课程表》,打印稿。

⑥ 《科学革命的结构》,同前,第119页。

⑦ 《科学革命的结构》,同前,第64页。

统社会学理论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转型的第一层历史涵义。

毫无疑问,没有对传统理论的否定就谈不上新理论的发展。但是深刻的否定,作为发展的环节不仅表现为对旧理论的批判,同时也表现为与既有理论的联系,即理论的扬弃关系。正是在这一方面,50年代的理论批判存在着如下问题:1. 缺乏对学术理论的纵深开掘,缺乏具体的历史分析;2. 学术争鸣未能展开,人们对传统范式的危机是否足以导致专业化中断,专业改造所蕴涵的范式转变的历史意味,这些本应深入思考的问题却迟迟未能提出。这使得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受到了潜在的影响。事实上,当着传统理论面临危机,如果能够展开学术争鸣,社会学专业化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学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的改革的努力已经显示出这样一种前景。令人遗憾的是,人们还未及深入思考一下范式转变的全部历史意味,社会学这门专业在随后而来的院系调整中就消失了。

2. 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与脆弱的理论转型

从1949年到1951年,中国高校中的社会学系依然在开课招生。显然,人们仍希望通过专业课程的改革使这门学科继续得到发展。据一些资料,在1948年中国有21所大学设有社会学系,在校生在600人以上。^①在1949年与1950年,高等院校分别有20所,14所大学设有社会学系。到1952年,中国尚有10所大学设有社会学系,在校生472人。^②

由于50年代初的苏联高等教育中没有社会学专业设置,在1952年9月,中国高校中设有社会学系的专业停止招生。原来设立社会学专业的10所大学有8所取消了该专业。只剩下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留有110名学生。在1953年,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最后7名学生毕业,至此,中国高等学校社会学专业全部撤销。^③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政法科学生数占高校学生数的比重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为1.6%。而1947年和1949年,政法科学生数占高校学生数的比重为24%与6.3%。^④

与此前后,中国高教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院系调整的方针,主要包括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进行课程改革,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高等教育要逐步走向计划化,实现统一领导,要调整全国高等学校或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⑤从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决定高校院系调整,至1952年底,全国高校的3/4已调整完毕,设置了专业。^⑥1953年,继续进行调整,“仍着重改组庞杂的大学,加强和增设工业高等学校并适当地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集中、大力整顿及加强培养与改造师资的办法”。^⑦至1953年底,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基本完成。^⑧

如果我们把中断问题的考察限于院系调整前后,中国社会学专业改造未能继续下去,参照苏联教育模式取消了社会学,的确是主要因素。然而,一旦我们把这一因素放在社会学思想发展的长过程中去观照,就会发现它不过是一个阶段性因素。这就需要我们稍许展开分析一下50

① 《发展中的现代中国社会学回顾与展望》,同前。

② 资料来源:《1949~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统计》,高教部计划财务司制。

③ 资料来源:《1949~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统计》,高教部计划财务司制。

④ 教育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⑤ 《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第1页。

⑥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1、60、70页。

⑦ 《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同前,第41页。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同前,第90页。

年代苏联模式的影响。

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谈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照搬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的确,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借鉴国外的经验是不可避免的。1949年10月,刘少奇曾谈过,“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的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①。在50年代初,中国教育从注重学习欧美模式向注重学习苏联模式的转轨,是与新中国成立时采取的“一边倒”的政治外交战略相一致的。

在50年代初,中国在获得国际承认和援助方面,采取了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种倾向性选择,首先是基于美国在40年代中后期采取了援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政策,使中共不能不联合苏联为代表的反帝力量予以反击。对此,一些国外研究者并不讳言:“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内战中对中共少一些敌意的话,中国也许会表现出一种更为平衡些的国际姿态”。^②其次,“一边倒”的方针与二次大战后美苏冷战的格局有关。在美苏从合作转向对抗的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打算过分偏向某一方。1944年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毛泽东同谢伟思进行了多次谈话,指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相互同情、彼此了解和利害相关的紧密联系。……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③但是,中共能否在美苏冷战中保持中立,关键的问题还要看美苏对华的态度。1949年5月,鉴于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采取了消极抵制态度,而苏联放弃了对国共两党的弹性政策,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很明显“一边倒”战略方针的确认,“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它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的产物”。^④

50年代中期,随着朝鲜战争结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中国开始认识到世界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的对立。与此同时,在国内建设方面,苏联经验中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也日益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先后提出了关于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针,并在外交路线上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一边倒”方针的结束。^⑤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苏联中断已久的社会学有了恢复的动向,1956年苏联派出代表团参加了世界社会学大会。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国社会学者的注意,在提倡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下,恢复社会学的问题被提出来了。不少学者都强调指出,由于中国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新社会学应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来进行具体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⑥,对于旧社会学“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也必须继承下来的”^⑦,这实质上已经触及到了中国社会学理论转型的第二层历史涵义——新理论在发展中必须吸收传统理论的合理因素,深刻的否定必须表现为“联系的环节”。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同前,第4页。

② R. Mac Farquhar, J. K. Fairbank 主编,王健朗译:《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③ J. S. Service 著,张琦等译:《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党史通讯》1983年第11期。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⑤ 郑晓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产生和转变》,《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⑥ 费孝通:《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取决于它的任务》,《新建设》1957年第7期。

⑦ 费孝通:《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取决于它的任务》,《新建设》1957年第7期。

然而,新旧社会学理论转型并没有来得及在学术上发育起来,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也并未充分展现出来,便随着骤然而起的反右派政治运动化为了乌有。社会学专业化重建的一次机遇失去了。

3. 毛泽东的选择及思想史背景

1956年7月,《新建设》杂志刊登了一篇社论《自由讨论,百家争鸣》。文章鼓励学术工作者“独立思考和勇敢探索……从争论中发展科学,求得真理”。1957年4月10日,《新建设》杂志编辑部邀请在京的部分社会学家20余人,就社会学的地位、任务、研究对象问题进行了座谈。与会者在以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展社会问题研究,开展社会调查,在批判旧社会学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的同时,吸收其合理成分等方面取得了共识。

学者们关于恢复社会学的讨论显然得益于“双百”方针所促成的活跃的学术气氛,而“双百”方针的首倡者正是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的。据一些历史学者回忆,毛泽东这种开放地对待学术争论的观点,早在1952、1953年就提出了。^①

“双百”方针提出后,立即受到了学术界、文艺界的热烈赞同。毛泽东还提出了开门整风的想法,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当然,如何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做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主题,无论是对执政的共产党还是党外人士来讲,都是一个需要探索的新课题。由于整风运动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复杂情况,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出现了偏误,同时也是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社会稳定以及国际共运发展等等考虑,毛泽东改变了整风运动的主题,发动了反右派政治运动。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社会学专业化重建不仅无法提到日程上来,而且不少学者关于恢复社会学的言论还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

同1952年院系调整一样,无论是在鸣放阶段有关恢复社会学意见方面,还是在尔后的反右派阶段对社会学展开的批判,毛泽东依然没有介入。那么,毛泽东对社会学专业化建设未予关注,是出于他尚不了解社会学这门科学还是出于一种倾向性选择,我们只能依据所能找到的资料展开实事求是的分析。

1957年初,一些社会学者关于恢复社会学的意见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3月份中宣部办公室印发了一本《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文中反映了科技教育界关于科研工作、学术争鸣以及党的领导的一些看法。毛泽东对《汇集》归纳的33个问题中的22个作了批注。耐人寻味的是,在第5个问题上,“哲学家提出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哲学遗产的继承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文学界、法学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要不要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学中那些对我们有用的问题也已经提出”。^②毛泽东阅后未予置评。

这里,首先可以肯定,对传统社会学的学术思想,毛泽东远没有象对哲学、逻辑学那样的学术兴致。当然,毛泽东未具体介入社会学专业化建设的问题也表明,尽管1957年下半年社会学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毛泽东也并未将其做为思想斗争的典型对立面来看待。看来,在1957年3月间,人们对毛泽东在《汇集》的审阅中未对恢复社会学表态一事,至少是当作可以争鸣来理解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在4月份,由《新建设》杂志主持,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关于恢复社会学的讨论。不过,人们禁不住要问,毛泽东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强

① 文严:《“双百”方针提出和贯彻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页。

国富民的发展道路,他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本来与社会学研究联系密切,而且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最有兴味的部分。然而,毛泽东对社会学专业化建设却没有表现出兴趣,这是为什么?

从一些资料看,毛泽东不谈论社会学问题,并不等于说他对社会学传统理论不存在一定的印象和看法。在毛泽东阅读一些论著和文章后所做的若干批注中,我们看到了他对社会学传统理论存有负面印象。

1958年6月,在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中刊载了一篇为“中间立场”辩护的文章。持有“中间立场”观点的人认为,走中间路线“是最全面、最辩证的”,“万事万物依存于极端的总是少数,多数是处于中间状态,因此普遍、共同、真实、真理正表现在多数这方面。”该文还把中间路线分为立身处世、工作作风和政治等三个方面加以具体论述。毛泽东阅后写下了七条批注,指出鼓吹“中间立场”的观点是相对主义、折衷主义的表现,世界观是极端唯心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强调立身处世走中间路线的地方,毛泽东批注道:“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学”,“反阶级斗争,反辩证法”。^①这里,毛泽东显然不是专门来评述社会学理论的。但从批注中可以看出,在他的印象中,社会学传统理论的错误就在于讲调和不讲斗争,是一种庸俗的社会发展观。从批注的前后文联系起来看,它反映了毛泽东关于社会学研究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意向:第一,传统社会学理论不讲矛盾斗争,不承认事物的辩证发展,这种调和斗争的取向与“中间立场”的折衷主义哲学观点是一致的。而毛泽东对调和折衷的观点在理论上一直持批判态度;第二,毛泽东否定传统理论的发展观,隐含着这样一种社会意识,只有用辩证法、阶级分析的观点,换言之,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考察社会,才能得出科学的社会学分析。当然,仅仅依据少量批注来阐发毛泽东对社会学传统理论的看法,说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意识仍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结合20世纪中国社会学思想史的背景予以展开。

在20年代,当青年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立意“大规模改造”中国之后,他对“社会政策”、“温和方法”之类的改良主义道路,就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认为它们“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②对于在中国发展问题上,只讲渐进改良,否认矛盾冲突,排斥社会革命,无论作为一种哲学观点,还是做为一种政治实践,毛泽东都明确地给予了批判。在《矛盾论》一开篇,毛泽东就将那种只承认事物发展有量的变化的观点列为“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在1936年读《辩证唯物论教程》时,毛泽东曾写过这样的批语:“渐进主义,庸俗进化论……渐进主义是庸俗的经验论,忘记了阶级根本利害”。^③在20世纪上半纪的中国发展道路上,对渐进主义发展观的证伪,最终还是来自实践。40年代中期,一些民主党派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找寻一条中间路线,并得到美国的鼓励。但是,随着人民革命力量由弱变强,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而国民党则加紧了对其的胁迫,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所指出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有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④如果说基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对社会学传统理论存有某种负面的印象,从而可以说明他为什么对社会学专业化发展没有表现出兴趣,那么这种解释仍就是部分的。事实上,毛泽东不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而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得292页。

②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和6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

且熟悉“唯物社会学”这类马克思社会学的概念,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分野。

1937年,李达撰定了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讲义,书名为《社会学大纲》,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此书,做了13000字的批注^①。1943年,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请他收集在“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并指名要他“曾看过的一本”由苏联人赖也夫斯基著的《唯物社会学》。^②毛泽东对马克思社会学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分野的了解,重要的理论来源是马列著作。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③在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卡尔·马克思》等论著中,列宁多次批判了旧社会学的观点。

由以上思想史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社会学问题不予置评,其原因看来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实践的因素,也有理论的因素。与其说他对社会学专业研究没有兴趣,不如说他对社会学是什么,持有不同于传统范式的另一番见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见解。关于这一点50年代一些学者发表的观点值得注意。

费孝通在谈到社会学领域中不同的理论系统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然也存在革命的社会学,那就是‘马列主义社会学’,但是由于‘社会学’这个名词已经被资产阶级所占有,排斥了革命的社会学,革命的社会学也有不愿用这个名词,以免混淆立场。所以,一谈到社会学,主要指资产阶级社会学”^④。关锋在一篇文章中特意指出,“这里应该说明:马克思主义决非没有自己的社会学;其社会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不过,我们通常不用‘社会学’这个名词罢了”^⑤。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无论在1952年还是在1957年,毛泽东都未介入关于社会学专业化建设的具体过程。不过,基于对传统理论的一些看法,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学专业化发展没有给予关注,这显然使处于理论转型时期的社会学专业化进程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在1957年以后,由于一系列国际国内的因素,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路出现了许多逆转,“左”的思想不断发展,中国发展的选择逐步导向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主要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⑥。在这种大气候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社会学,不仅其专业化重建根本无法提到日程上,而且,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文科教育损失严重。这种局面直到80年代才得到根本扭转。从中国社会学思想史的视角来看,这一重建正是理论转型的一个实现。

很明显,做为上述的一系列复杂社会变迁的一个结果,如果说中国社会学专业化重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行动的选择,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把专业中断归结为个人行动的结果,是否也过于简单了?

三、专业化建设中断的社会学再认识

当我们把专业化中断的过程置放在20世纪中国发展的进程与社会学思想史的广阔背景中

① 石仲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③ 逢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毛泽东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页。
④ 费孝通:《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决定于它的任务》,同前。
⑤ 关锋:《“不通”和阴谋》,《新建设》1957年第10期。
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第240页。

加以观照,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就不再是几个相互冲突的经验事实,而是契合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与人的选择组合而成的具有多方面规定性的社会过程。对专业化中断原因的追寻,触及到了20世纪上半纪中国思想家、学者关于发展道路的历史争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功与传统理论的危机;触及到了50年代初社会学的专业改造,中国高等教育从学习欧美模式到学习苏联模式的转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态势以及国际政治的格局;触及到了个人社会行动与思想史的关联、60年代关于中国发展的理论探索等等。

正是置放在这样一个微观与宏观、个人选择与发展情境互动的丰富历史过程中,我认为,50、60年代中国社会学专业化建设的中断,可以这样来定义:它是发生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折时期,基于中国社会学理论转型的迟滞所导致的专业化发展的断裂现象。

从共时态上看,专业化中断凸显了三个结构性的社会因素:1.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获得成功,传统理论产生危机之时,中国社会学理论开始了范式的转换,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理论转型的开始。但是学术争鸣未能展开,学科地位受到影响;2. 在学习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阶段社会学专业被取消了,因而理论转型迟滞了;3. 1957年前后,中国社会发展开始了新的理论探索,同时也开始受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思路的干扰,一度有希望的社会学恢复被搁置起来,理论转型再次延迟。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开始列举的三种关于社会学专业化中断的观点,尽管它们在概念的表述和历史内涵的界定方面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实际上不自觉地指向了上述三个结构性因素。当然,这些观点都没有注意到三者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将这些因素放到思想史的过程中考察。

从历时态上看,上述三个结构性因素的每一个均不足以构成导致中国社会学专业化中断达27年之久的全程性变量,它们在不同时期的相继凸显和影响表明,这些因素是阶段性的局域性变量。不过,它们的凸显的确向中国社会学发展提出了贯穿于中断全程的极具理论色彩的三个重大问题:1. 如何看待不同理论范式和观点的争论,能否通过学术争鸣求得学科繁荣?2. 如何看待国外社会学的思想发展及其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是采取有分析有批判的态度,还是照搬照抄?3. 中国社会学研究和专业化发展,与中国思想家、学者社团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认识和争论存在着怎样的一种联系,采取“顺应功利实用的潮流,以图自保”^①的办法,能否达到发展社会学的目的?这恰好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转型所面临的和应予解答的问题;从思想史的层面来看,理论转型的延迟也正是这些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的表现。

5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范式转换并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结果。一般说,“新理论都只能在常规解题活动已宣布失败以后才能涌现”。^②从学术背景看,传统理论的危机主要是由于其均衡论的功能主义、经验分析的理论框架,根本无法容纳社会冲突、社会革命,把它们统统看成“反常”、“失范”、“变态”。但是,一场宏大的革命就在人们眼前发生了,成功了。显而易见,不打破旧理论的束缚,就无法推动中国社会学理论随着发展的现实,做出合乎历史的逻辑抽象。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历史地看待50年代的批判传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出现理论转型。

但是,深刻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旧理论的全盘否定,这种否定是消极的,它割断了历史。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表现为联系的环节。具体说来,这意味着新理论也面临着自身的发展和理论转型,这包括:第一,理论研究从以社会革命为主题转向经济、文化建设为主题,从“革命的社会

① 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湾1982年版,第127页。

② 《科学革命的结构》,同前,第62页。

学”转向面向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学；第二，在新的发展问题面前，新理论需要开放地吸收传统理论以及国外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遗憾的是，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与传统学派所面临的理论转型问题，“从结果看都没有解决好”^①。转型的延迟所提出的中国社会学认识史方面的问题是引人深思的，它表明，正确地开展学术争鸣和中外社会学理论选择，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基础。如果人们在理论探索中采取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对国外思想采取要么排斥要么照搬的态度，其结果都无助于社会学的发展。

很有意味的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转型阶段所对应的发展时期，恰好是20世纪的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转折阶段。理论转型的第一层含义——新旧范式转换，其历史内涵实际上是针对上半纪人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的一个总结，它回答了中国现代化发展为什么不能照搬欧美的先发展模式，而必须先完成民主革命，争取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为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稳定的政治环境。理论转型的第二层含义——在新范式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探索，其历史内涵是面向20世纪下半纪中国发展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这使我们看到，社会学的发展，无论学者们是强调它的微观研究层面或是宏观研究层面，其学科的命运点是同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正如笔者前面所指出的，如果不是重复前人的观点，则重述历史是一种理论行为。因为，“只有有了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信念”，才能对历史“重新进行选择、评价和批评”。^②的确，对专业化中断的历史的重新审视，渗透着系统分析和认识论的批判性思考。它使我们拓展了思想史的视野，看到了经验研究所无法看到的东西；事物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在其过程的发展阶段上所呈现的特点。在这样的历史面前，经验分析是沉默的。

随着理论分析所展开的50、60年代中国发展的若干重要场景，中国社会学思想家、学者对发展选择的思考，不同学派的思想交汇及其成功与失误，这些都表明，即便是在专业化中断时期，中国社会学思想的历史与人的选择，也并非全是一片瓦砾，并非是一段无话可说的空白。的确，专业化中断造成了专业知识、人才的浪费，许多社会学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与国际研究水平的差距拉大了。但是，也应当看到，专业化中断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家、学者为恢复社会学做出不懈努力的历史。从50年代初社会学的专业改造到1957年“双百”方针倡导下社会学专业化重建的尝试，直至80年代中国发展的重心实现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社会学专业化重建的迅速展开，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学思想家、学者社团始终在关注和思考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他们为纠正失误，发展中国社会学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责任编辑：张宛丽

① 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② 《科学革命的结构》，同前，第13页。